

大学与职业衔接关系的重构

金子元久(筑波大学)

苑复杰译(放送大学)

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大学教育与职业的关系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2015年,「日本教育再生执行会议」要求将“实践性的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来讨论。「日本文部科学省专家会议」就创建「高质量实践性职业教育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讨论后,这个问题被提交到「中央教育审议会」进行审议。

学生在大学期间接受的教育与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存在着何种关系,以往并不明确。但是,在职业和社会的存在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教育与职业关系的模糊性致使社会产生了对大学的强烈不信任。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来自社会的挑战。

1. 大学教育与职业

大学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即“大学与职业的衔接”,可用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来表示(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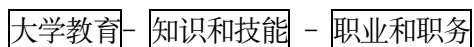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教育与职业关系示意图

大学教育给予个人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成为个人胜任职业和履行构成职业的各种职务(工作)的基础。而职业上的要求又规定了在大学需要习得的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习得这些知识和技能就成为大学教育的目的。

●职业的逻辑

回顾大学的历史,追溯渊源,中世纪的大学是教授神学、医学、法律学这三个领域的高度专业化职业教育机构。从以上图示的逻辑来看,在这三个领域,大学教育与知识·技能,以及职业之间是以直线关系相对应。即使在现代,在培养医生、律师等高级专门职业的教育领域,大学教育和职业的关系也是由体系化标准化的专业知识为媒介构成直线关系。

但是大学教育与职业的这种直线的对应关系进入近代后开始崩溃瓦解。这是由于职

场的职业·职务与大学的知识·技能,这两者之间互相关联同时又是按照各自的逻辑发展而来。

从职业·职务的观点来看,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端知识的职业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产生了对农业、工业等产业领域的人才需求。医生、律师等(独立)高级专业人士的职业,基本上是以每个个人为单位执行各自的职责。与此相反在工学、农学等领域是通过属于某个组织来履行职责。因此,职务上要求的知识·技能也就无法明确地定义。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企业组织或政府组织规模巨大化,为了支撑这种巨大组织,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作为白领被雇用到大组织中来。在这种巨大组织中职责是根据组织的需要被分配和规定的。这种变化导致了大学的教育内容·学习成果与在职场上发挥能力的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在大学学到的东西不是被直接拿来使用,而是被期待成为获取在职场工作的知识·技能的基础。

●大学的逻辑

另一方面,进入十九世纪后,大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成为其原动力的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即以洪堡理念为象征的近代大学的逻辑,就是要把大学办成以学术逻辑为轴心的、学术研究内在发展的中心。洪堡理念主张大学的教育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让学生间接地参与对真理的探求,在这个过程中陶冶人格。

然而,大学的组织形式因国家而相异。就德国大学而论,其组织形态是在法学、神学、医学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加「哲学(理学、文学)院」而形成。另一方面,为培养与现代产业相对应的工学、农学等技术人员和经营者,在大学外设置了职业高等教育机构。虽然法国和英国的大学发展与德国略有不同,但在大学外设置职业高等教育机构的做法是相同的。

与此相对,美国的大学是以与职业教育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文理教育为基础。在十九世纪后半,州立大学以为现代产业培养人才为重要的功能而得到发展,各专业领域的教员组织是以“学科”组成,学生的教育单位是以采取与“学科”相平行的“教育课程”编成。进入二十世纪后,医学、神学、法学等教育课程作为高级专业研究生院也融入了大学体系。

●大学与职业衔接的扩散

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对于知识人才需求的扩大和多样化,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是以学术逻辑为轴心扩张发展,这两个事项是根据各自的逻辑发展而来。其结果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衔接变得越来越间接。随着知识职业的多样化,年青人对未来职业的展望越发困难,这使得大学教育与职业·职务的关系也更加不明确。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教育与职业·职务的关系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还是散乱,不透明的。这意味着作为两者之间媒介的知识·技能的理念也变得更暧昧模糊。可以说,战后

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正是这种倾向爆炸式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这种倾向某种程度上是国际上的共通现象。

2. 日本的特点及其变化

上述的趋势,可以说在日本的表现特别显著。

●日本的特质

从经济社会结构来看,日本的现代产业是依靠引进西方国家的各种生产和经营技术实现的,而且这种引进是把生产技术与近代企业·政府组织系统相组合成套导入的。因此有关职务的知识·技能最初就组遍于企业和政府组织中。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掌握了专业知识·技能的大学毕业生的独立性也很薄弱,他们被定位为在组织中担当高级职务的有知识基础的人才。

此外,战后经济快速增长是依靠企业经济的急速增长和其组织的快速扩张而实现的。这导致了作为组织管理要员的白领的迅速增长,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增加带来大学升学率的急速上升,而新增的这些大学毕业生又作为白领阶层就业。在这个过程中终身雇佣成为标准,就业者的职责则被组织牢牢绑定¹。

而且,从社会整体来看,作为技术引进产生的现代化成果,高生产率部门和低生产率部门之间的差距至今仍残存在企业之间,学生为了寻求在高生产率企业就职而进行激烈竞争。由于企业无法明确界定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因而就强调在企业内部再学习时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大学入学考试的选拔结果被当成测量基本能力的指标,在大学习得的知识·技能往往被轻视。

日本的大学在初建期,其组织形式是把与德国大学基本相似的「学部」作为基本单位。但是日本大学又与美国模式相同的是,它把与现代职业相对应的工学、农学、甚至经济学等领域也分别建为「学部」,而使之成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战前的日本旧制专门学校被重组升格成为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大学内部组织形式更接近美国的模式。但是「学部」的纵向分割组织原理依然被维持下来,「学部」成为教员和学生的归属单位,而且「学部自治」的理念赋予了「学部」强大的自主权。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大学是在由学术专业分割开来的组织形态下发挥其教育功能的。

从结构上看,职业·职务与大学教育内容的背离在日本是最为显著的,它造成了结构性的不透明。因此日本大学教育的社会功能就只成为一种虚构,从而潜藏了社会对大学教育的根源上的不信任。但是,当大学教育与企业的生产率能够兼容共存,社会对大学的批判就较少浮出水面。可以说,这就是日本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

¹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文作者的著作『大学教育的再构建』,玉川大学出版协会,2013,第6章。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危机

但是以 1990 年代为界, 这种结构发生剧烈变动。成为其背景的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 由于日本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生产, 造成了对高中毕业的一般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减少, 同时以 IT 技术发展为背景, 社会对高中毕业的事务性劳动者的需求也在缩水。被剥夺了良好就业机会的高中毕业生便朝向大学走上升学之路, 日本四年制大学的就学率从 1990 年的 38%, 已攀升至 2015 年的 50% 以上。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入学的大学学生的结局则是在大学毕业后面临就业难的困境。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学校基本调查』的数字, 是根据大学掌握的大学毕业生的去向状况, 统计出毕业生就业以及读研的比率。1990 年这个比率已经达到了近 90%, 之后迅速下降, 2000 年初下降到 70% 以下。虽然近年来经济复苏, 这个数字有所回升, 但 2014 年春天也仅达到约 80%。反言之, 对 20% 的毕业生大学未能核实其就业状况。而且, 毕业生就业后, 近 30% 在入职三年内离职, 大学毕业生的低位, 不稳定雇用成为普遍现象。此外, 大学入学率的扩大是由奖学金贷款支撑的, 目前整体学生的约 40% 接受奖学金贷款。就此而言, 就业问题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上现象使过去被放置不问的大学教育与职业的模糊关系受到社会关注。2012 年底, 田中真纪子元文部科学大臣提出的“大学过剩论”则是这种潜流表面化的一个佐证。而且如上所述, 尽管大学教育与职业的模糊根源存在于社会和大学两方, 但其责任追究却向着大学。大学应该如何接受这个质疑已成为现实问题。

●日本特点的变化

在思考上述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澄清日本大学的特点现在有何种变化的可能性。我们上面谈到, 日本特点的基本性质是企业组织内部的职责被嵌入组织中, 以此为前提设想职务上需要的知识·技能, 其结果是职业·职务与大学的教育内容难于相结合。而企业组织的存在方式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 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反过来考虑一下美国的例子, 在美国, 战后的经济增长也是依靠大型企业的扩张而实现的, 这一点与日本是相同的。但是, 1980 年代后半期, 美国的产业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结果是对大型组织进行分割, 对企业进行改编整合, 从而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白领的流动性。为此, 大学毕业生白领劳动者需要到外部组织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 从而产生了劳动者接受再教育的需求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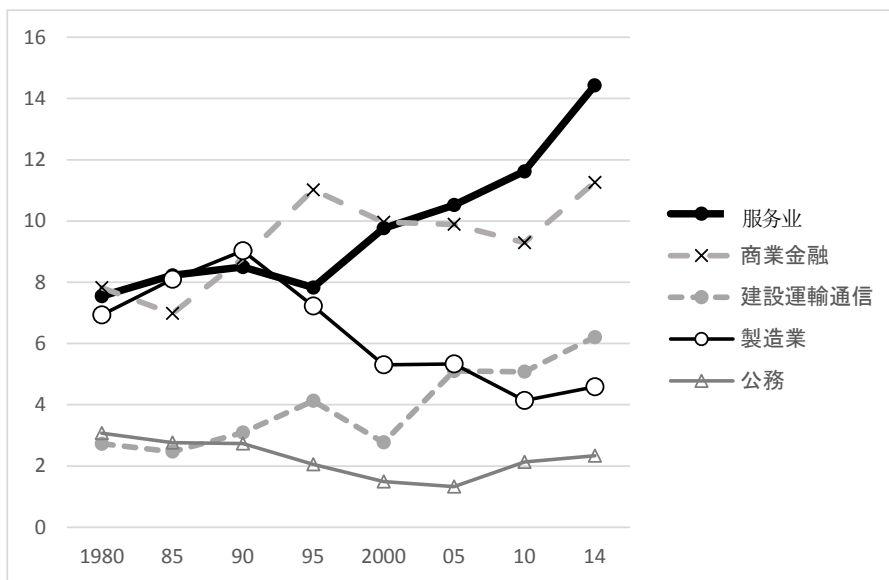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之间, 作出了这种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也将在日本发生的预测, 有不少人提出意见, 要求大学教育要适应这种变化。但是至少到现在, 仅从观察大型企业而言, 这种征兆还没能明确地显现。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原则上都是在四月一揽子招收毕业生, 而且在雇用

² Cappeli et al. Change at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人员时寻求的知识·技能一直是用“成长的可能性”这样非常抽象的词语来界定。

然而在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稳步发生变化的事实。我们看一下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产业部门类别分布变化(图2),在大量雇用大学毕业生的制造业,1990年前后,就职者人数每年有9万人左右,之后迅速减少到4万人左右。而且即使是在近期的景气复苏期,预计也得不到大的回升。1980年代在商业·金融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急速增长,但随后一直停留在约10-12万人的水平上。

与此相反,让我们来看一下得到极大扩展的服务业就业情况,1990年中期只有8万人,2014年到达了15万人左右,增长了近两倍。另外建筑·运输通信领域的就业人数也在增加,尤其是通信业的扩大招聘,2014年达到了1990年的近两倍的6万人。其结果是,在2014年这个时点,全体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半数以上人员就职于上述两个行业。经济的服务化,信息技术化极大地体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上。



数据来源:日本学校基本调查各年度

图2 大学毕业生就职者产业分布(万人) 1980-2014年

毋庸置疑,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反映了对医疗、健康、教育、心理等专业需求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已产生了新的专业衔接。但是,服务部门的雇用扩大,其意义并不停留在此。毋宁说是社会和人的多样的“服务活动”开始扩大。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电信业。

这些新领域的活动需要与拥有各种新知识和技能相对应的新职务。然而,在这些领域,大型企业的垄断薄弱,以往的企业组织管理和培养职务与知识·技能的机制也是相对薄弱。毋宁说这些新领域要求每一个从业人员获得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培养这种从业人员也正是新产业形成的条件。

3. 从扩散衔接到多重衔接

这种形势对大学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政策上的一个焦点是寻求以职业准备教育为目的的高等教育的存在方式。[日本教育再生执行会议第5次建议(2014年)]提议新设“进行实践性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制度。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对大学进行分类,将大学分为根据学术原理施教的大学和进行职业准备教育的大学,目前这种观点受到关注。以这些舆论为背景,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立的有识人士会议提议,根据学校教育法第一条将现在的专门学校的一部分办成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现实中,一部分专门学校敏感地回应地区的需求在设置职业教育方面拥有不少出色的成绩。当高中毕业生对具体的职业报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有效地促进了人格成长。在这个意义上,特别给予短期职业高等教育在制度上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但是,对于把授予学士学位的四年制职业高等教育机构与大学分别开来,并将其制度化的作法,对此我不得不抱有疑问,18岁到22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正处在成长过程中”,大学四年期间只能限于履修以特定的技术知识为前提的教育课程,并使之制度化的作法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授予学士学位为前提的课程,即使目标是教授特定领域的技术知识,在这种课程背后准备一定系统性的知识基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从制度上看,如授予同样的学士学位,这两种大学在教育课程和内容上不应该有很大的差异,纵观国际趋势,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如此想来,我认为在现存的大学制度框架中,纳入培养职务知识的教学计划,这在很多意义上都是有效果和高效率的。在一方面提供学术课程的同时,另一方面提供特定的职务需要的教育课程也不是不可能。实践中已经这样做的四年制大学也不少。

然而,要真正发挥这样的功能是需要几个条件的。

第一,需要改变现行大学的组织存在方式,即要改变把根据学术专业领域组成的“学部”直接作为教育学生的基本单位的这种组织形式。即使教员归属于以学术专业领域为基础的“学部”组织,而学生的教育所需要的是与学部相独立的,复数的教育课程的并存,而其中一部分是以职务知识技能为教育中心内容的复合型组织。前面提到的,美国大学的学科与教育课程的关系使这种灵活的教育功能成为可能。重要的是让学生可以在复数的教育课程中选择一个特定的课程,或者是给学生留有进一步重选课程的幅度。

第二,面对现今极其多样的流动的职业和职务,大学应该具备一种经营能力,即从职业职务要求的知识·技能中战略性地选择自己大学可以回应的,应该对应的,并能将其组成教育课程的经营能力。并且大学要对回应这种变化的教员给予鼓励,有效地任用有实践经验的教员,以及有效的统筹管理的方式是必要的条件。

第三,如此设置的职业准备教育课程的质量保证机制是必需的。可以说,这是各个大学自身的课题,但同时这也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课题。以现行的学部为基本单位的日本大学设置标准不符合这种多样的教育课程计划,对此要进行修改。同时,在认证评价中,对教育课程计划分别进行评估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总而言之,大学将大学教育和职业职务之间的关系扩散地放置是不能被允许的。超越这个瓶颈,为促进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需要创造大学教育与职务之间的多重衔接,并使其透明化。从现今一些大学的实践来看,各个专业领域已经开始进行形成这种衔接的尝试。

为了使这种动向更进一步发展,要把大学教育应该培养的知识·技能不只是局限于专业知识,而要扩展到思考能力等泛用能力,还要包括自我认识能力·积极性等多层次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谋求大学教育与职业的衔接。为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政策上的条件,大学的构想力同时也不可缺少。我认为大学作为学问之府的现代意义就存在于其中。